

绪 论

(一)

“广府”是个历史的、变化的概念。广府，即广州府的简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朝，在广州设总管府（12年后改名）。唐朝武德至贞观年间，广州先后设总管府、大都督府、中都督府。当时广州及其所辖地区的人已被称为“广府人”。至明代，广州地区更明确称为广州府，该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阳山、连山等15县及连州。清代初期，广州府下辖南海、番禺、顺德、三水、东莞、新安、增城、龙门、香山、新会、新宁、从化、清远、花县等14县。嘉庆年间（1796~1820），广州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新宁、增城、三水、香山、新会、新安、花县等12县，肇庆府辖高要、四会、高明、开平、恩平、鹤山等6县。而两府皆流行广府话。清代海外华侨剧增，当地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分帮而治，加上华侨喜欢同语同乡而聚居，遂有“广府帮”之称。广府帮或广肇帮实指讲广府话的华侨。一般来说，祖籍为广府民系地区的华侨皆称广府帮，本书简称为广府华侨。自1955年中国不承认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起，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侨便惯称为华人（在外国也称华族人），故有“广府华侨华人”之称。

广东三大民系包括广府民系、福佬民系（流行潮州话）、客家民系（流行客家话）。广府民系流行的广府话，即粤方言，也

称粤语、白话、广州话。广府民系（粤语系）地区主要包括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含香港、澳门）、粤中、粤西、粤西南与粤北部分地方及广西南部。广东省内的粤语系侨乡主要包括广州（含番禺、花县、增城、从化）、佛山、中山、南海、顺德、东莞、三水、肇庆、清远、信宜以及五邑地区等。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广东省的居外广府华侨华人有 327 万以上。如果加上香港、澳门等广东省外地区，据 1996 年 12 月出版的《广东省志·华侨志》记：祖籍粤语系地区的华侨华人约 700 万人。

当代学者认为广东境内的粤语系地区可分为广府片、高廉片、罗广片、四邑片。广府片主要包括广州、佛山、南海、番禺（今广州番禺区）、顺德、三水、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从化、增城、东莞、中山、肇庆、宝安、深圳、珠海、高要、高明、清远、龙门、佛冈、新兴、云浮、英德等县市，还有韶关、曲江、乐昌等县市的城区。高廉片主要包括阳江、阳春、茂名、高州、电白、信宜、湛江、遂溪、化州、吴川等县市。罗广片主要包括四会、罗定、德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阳山、连县、连山等县市。四邑片主要包括江门、新会、恩平、开平、台山、鹤山等县市，今称五邑。

粤语系的各个片之间，语言方面也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特别是四邑片与广府片之间差异更大，故近人研究广府文化从中分出一个“五邑文化”。但是，记述广府华侨华人的历史理应包括四邑片侨乡的华侨华人（同属广府民系），不过鉴于本书所属的“广东区域华侨华人史丛书”，已另有《五邑华侨华人史》，故笔者总体概述广府华侨华人时含祖籍四邑片的情况，具体记述对象则以祖籍广府片的华侨为主，部分也记及四邑片及高廉片、罗广片的华侨。

本书所记人事的时间下限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但个别突出的人、事为保持完整性也有所延伸。应该指出，20 世纪最后的

20年间，广府华侨华人已增加不少，居于各大洲的广府华侨华人比例也大有变化，这有待后人再作研究了。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过去。人们了解过去历史的目的，并非发思古的幽情，主要是为认识现在与预见将来。这也是笔者编写此书的主旨。

（二）

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在古代历史上称为“唐人”、“华人”。至于“华侨”一词，据专家考证，最早见于广州府香山县人郑观应1883年的《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一文，以后“华侨”一词逐渐通用，成为旅居外国的中国人的通称。

世界上出现移民现象必有推力与拉力。对广府移民的推力与拉力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广州是汉代开始形成、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广州的外贸名城地位历千年而不衰，这对广府人眼界开阔、认识外国的生存空间是大有影响的，而因外贸发展造成的交通运输发达，更为移民提供了十分方便的到海外的交通手段。其二，历史形成的广府人重商心态，以及因战乱或灾荒造成经济不景，促使广府人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其三，西方殖民地社会急欲发展而寻求新的劳动力，广府人得信息之先。其四，广府早期移民与故乡联系密切，牵引大批乡亲陆续出洋。

广府华侨的祖籍地中心珠江三角洲，负山面海，地理环境独特，使远古百姓已有经海上到东南亚之举。而在广州与各国贸易频繁的影响下，更增加了广府百姓到外国的可能性。秦汉时，古广州（时称番禺）已有对外贸易，故百姓早对外国有所认识。唐朝时中国是世界强国之一，影响深远，故外国人称中国人为

“唐人”，华侨称祖国为“唐山”。唐代广州是世界闻名的港口，“广州通海夷道”是国际贸易最长的航线，广府人自然也多到外国经商。经商的同时，也开始了文化交流。古籍记载，唐代已有广府人因译经至“室利佛逝”（今属印度尼西亚），后来终老于当地。可以设想，唐代已有因经商而移居外国者，只不过少见于古籍罢了。宋宣和元年（1119）朱或的《萍州可谈》记：广州有住藩十年不归的商人。以后历代广州皆是外贸名城，广府人与外国人的联系越来越多，所以不断有人移居外国，至清代更有大批广府人到国外谋生。

由于对外国新的生存空间并不陌生，故广府人因政治原因而避居东南亚乃至日本、美洲，是很自然的。唐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一批商人逃至国外；元初，南宋灭亡于广东新会，广府的不少宋代遗民避居外国；明代黄萧养起义失败后，一批水藤乡（后属顺德）人乘船出海抵印度；明朝灭亡后不肯仕清的广府官兵移居安南（今越南）垦荒开发；清代太平军、洪兵起义后，花县、禺北（广州北郊）的乡民，以及义军亲属、天地会中人，为避清官府的缉捕而逃往外国；晚清维新派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的广府人也有一批，民主革命派在国内策动多次起义失败后，也有一批广府人避居海外。

自明代时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东方扩张，1511年葡萄牙人东到马六甲，1521年西班牙人占有菲律宾，1595年荷兰人占有爪哇，1602年英国人组织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竞争。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殖民地急需大批劳动力，形成对广府移民的强大拉力。

明代，朝廷海禁时断时续，但仍不断有出洋的广府人。清初亦实行海禁，至17世纪末，清朝“开海贸易”，广府人出洋渐增，外国驻广州商馆开始偷运华工出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天灾人祸导致广府大批青壮年出洋求发展，西方人的合法招

工吸引了一批广府人出国，“苦力贸易”也诱拐不少广府人离乡背井到外国谋生。

19 世纪下半叶起，无论谋生者、避难者，到了外国后为了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广府人也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聚居一起，逐渐形成唐人街，以血缘（同姓）、地缘（同乡）、业缘（同业）为纽带组成社团，互济互助，共图发展。他们为侨居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从掘金、筑铁路到以“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行业逐渐向商界发展。华侨社会的同乡会馆、华文报纸、华文学校，被称为“侨社三宝”。而唐人街的牌楼、石狮、庙（或亭）也成了吸引游人的“华埠三景”。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华侨均受到“排华”势力的迫害，并在不少国家中遭受歧视。尽管留下来的华侨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聪明才智，逐步改善了生活，但发迹者总是少数。他们在艰难谋生的同时，也盼望祖国早日富强，以提高他们的地位。

19 世纪下半叶以前，华侨恰似“海外孤儿”，历代皇帝不把华侨放在眼内。19 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的增加，以及他们在异国遭受欺凌的现实，促使清朝廷开始关注华侨。虽然，由于国贫军弱，朝廷的护侨远远未如人意，但晚清不少外交官员（特别是广府籍的），为保护华侨、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做了不少工作，对开发华侨民智起了好的作用，洋务派官员始有吸引侨资之举也影响着后辈华侨，这段历史是不应抹煞的。

晚清大量广府知识分子出国，提高了华侨的文化素质。以广府华侨为首的改良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广做宣传，团结华侨社团，并创办报刊、学校，促使华侨的爱乡情结升华为爱国情结，萌生改变祖国政制的宏愿。

19 世纪的后 20 年至 20 世纪的前 40 多年这段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广府华侨最大的特点。它使华侨文化发出夺目光辉，也使广府文化、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之林中居于前列位置。有远

大志向的广府华侨与其他爱国华侨一道，积极寻求强国、救国的道路。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容闳对中国人赴外留学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起了促进作用。孙中山等广府华侨知识分子更把华侨的民族意识推向高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广府爱国华侨参加并支持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倒袁的“二次革命”斗争、建立广州革命政府的斗争等，以后又参加与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战争，均作出重大贡献。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的爱国热情举世钦敬。与此同时，他们还回到祖国、家乡经营实业，捐资办教育和公益事业，对祖国、家乡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其中华侨回广州创办中国第一家进出口商行、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橡胶工厂等，均令世人瞩目；归国的广府华侨对广府文化的发展亦功勋卓著。

20 世纪下半叶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加、澳、新等国的排华政策有了改变，华侨的地位逐渐改善。中国实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更使华侨向华人的地位转变，华人社会成了当地多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华侨的心态是“落叶归根”，但到 20 世纪下半叶，他们的心态已转为“落地生根”了。此期间，广府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以小商贩为主体的经济结构，逐渐转向工、商、农、金融、房地产、海运与旅游服务等多产业并举的经济结构，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得到较大发展，出现一些拥有巨资、跨国经营的产业。不少新一代广府华人当上了教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有些人还成为一流的科技工程人员。过去的同乡会虽有不少仍存在，但新成立的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各种团体更发挥作用。在政治上，因大部分华侨已转变为华人，效忠中国的观念已转变

为效忠所在国，故一些广府华人已在所在国参政，并担任较高的职务。

华侨华人群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今后仍会不断有粤语系地区的人民移居国外，这是正常的现象。中国并非惟一，甚至也不是主要输出移民的国家，但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对其祖籍国的认同与联系密切的程度则是十分突出的。这种密切关系曾因华人群体逐渐融入所在国大社会而逐渐减弱，也因新移民潮出现而重新加强。在这方面，广府华侨华人是较为突出的，他们对祖国与家乡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地区发挥华侨众多、毗邻港澳的优势，各级政府与侨务部门明确把侨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积极开展对外联系，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不少广府华侨华人捐资发展家乡的教育和公益事业，为家乡经济建设献计献策，并大量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促进了侨乡的经济飞速发展，使之进入全国富裕地区之列。

历史证明，华侨华人不分祖籍地域团结起来，才能提高在所在国的地位；无论哪一个国家，平等对待华侨华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歧视华侨华人将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而中国对华侨华人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支持他们的事业，鼓励他们发扬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传统，就能够取得侨心，获得他们对中国各项事业的支持。华侨华人必将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编

19 世纪上半叶及以前的 广府华侨

广州的历史悠久的商都地位影响了广府人早就萌生出国谋生与发展的意识，唐代已有成批广府人出国，宋元明清之际代有发展。然而，19 世纪上半叶及以前，由于祖国封建王朝统治者的专制与自大，华侨基本处于“有国难回”的境地。“海外孤儿”般的华侨在异国遭歧视受排挤时，国内的皇朝漠不关心，华侨只有在海外团结起来，成立同乡会等组织，为求生存谋发展而艰难拼搏，因而形成唐人街雏型，为日后华侨社会的发展打下基础。

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对广府移民的影响

第一节 汉晋时期番禺的对外贸易

广府人出国的原因与广州早已与世界各国有贸易联系是分不开的。要寻找先辈出海的印记，可以先看文物。

1989 年，在珠海市扁担岛宝镜湾发现了春秋时或更早时期

制作的岩刻画。画中几处有船只与乘客。如“天才石”岩刻中，有一只长 85 厘米的船，船头尖长而翘，饰有鸟头，船身以两线为代表，船中竖起一支 70 多厘米高、挂有旗幡的高竿，仿若桅杆与帆，船旁还有 3 个船锚；在“大坪石”岩刻中，有 20 多个人与动物围着大船跳跃欢笑，像是船启航前作祭祀的场面。专家鉴定这些岩刻画制作时间约为新石器晚期，故可断定距今两三千年的之际，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越人已能使用有原始桅帆的船出海了。

在广州，也有秦代造船遗址。可证先秦时期广州已能造一定规模的船。而看广州汉墓出土的有舵陶质船模，也可知汉代广州造船已有较高水平。这批我国发现最早的有舵船模，其中一种大型船模有 10 桨一橹，船上建楼、船后设舵。这样的船在我国出现，比欧洲早了 1 000 多年。

由于造的船有相当规模，远航便不在话下了。能远航，就可与外国通商，所以，广州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外国进口商品便毫不奇怪。

这里要提一提南越国的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发兵进攻岭南。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卅三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其中的南海郡相当于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南海尉任嚣在郡治番禺（古广州之名）筑城，此为广州建城之始。任嚣后来病重，把大权交与龙川令赵佗。秦末天下大乱，刘邦于公元前 206 年建立汉朝，赵佗于公元前 204 年左右建南越国，定都番禺。赵佗活了百多岁，到前 137 年才去世。接任的是其孙赵昧，即南越文王。他在位时间是前 137 年至前 122 年。南越国历 5 主 93 年，至前 111 年才被汉所灭。

已发现的南越文王墓是一座大型石室墓，里面陈列着众多精美文物，其中不少令中外贸易研究者注意。如有蒜瓣形凸纹的银盒，与西方多有发现的古代银器风格相同。还有 32 枚金花泡饰，

泡呈半球形，球面泡体分布 4 堆小金珠，以焊剂固定于表面后加热焊牢。这种焊珠工艺与中国古代传统金银器加工方法不同，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焊法相同，可证是外国商品。还有铜熏炉中的香料及 5 支原支非洲象牙等，皆可证西汉初以番禺为都的南越国已与外国有贸易来往。这一点从已出土的南越国王宫遗址中也可证。那里的文物中有一枚刻有外国人头像的象牙印章，可证外国人在南越国时期已与本地人多有交往。而南越王墓出土了 6 大类 20 多种丝织品，可证当时丝绸业的发达，亦见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地位。

在广州出土的其他西汉墓，也有明显的舶来品与反映古广州与海外有交往的器物。如西汉后期墓中的串珠，质料有玛瑙、鸡血石、石榴石、水晶、琥珀等，与中国古代工艺品不同，专家经考证均认为是舶来品。又如若干汉墓中出土的一些陶俑灯座与侍俑，俑的形象酷似西亚或东非人种。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土的远古文物，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型器物非常相似。如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与沙捞越河口，出土有公元前 6 世纪和公元前 112 年我国秦汉时的“五铢钱”；苏门答腊出土的一个铜鼎，底部有西汉初元四年的铭文；加里曼丹出土的陶甗与广州出土的汉陶器十分相似。类似的例证还有不少。此皆可证秦汉时古广州的海外贸易已有一定基础。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汉灭南越后，即派使者带船队从番禺起航，沿着民间开辟的航道从徐闻、合浦出海，从事官方对外贸易，到达马来半岛、缅甸、印度半岛南部，直至锡兰岛。这标志着以古广府地区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贸易不断发展，历久不衰，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也在中外交往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在列举汉初全国 19 个有名都

会时，特别突出 9 个大都会，番禺（古广州）是其中之一。东汉成书的《汉书》中，也记及番禺是商贸发达的都会，贸易的商品有“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等。

东汉时，番禺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大秦（罗马帝国）商人已经从海道到番禺与中国通商。汉末时，番禺已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要外贸出海港口。

汉末三国时，番禺是吴国所辖。226 年（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晋书地理志》）

晋代时，广州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东南亚国家到中国时，自马六甲海峡以东经南沙群岛穿过西沙群岛再经海南岛以东到广州南海郡的港口，这些港口中以番禺最为优越，因为番禺港口优良、腹地广阔。晋代僧人法显从耶婆提国（今爪哇）乘船回国，船上人说 50 天便可到番禺。因此，晋代的中外商船往返于南洋和广州的大增。这时，从广州出口的有各种丝织品与陶瓷器，进口的有珍珠、犀角、象牙、璧琉璃、珊瑚、琥珀、水晶、沉香、郁金、苏合、兜鍪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广州有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共有 10 多国：大秦（罗马帝国），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扶南（今柬埔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盘盘（在马来半岛），丹丹（在马来半岛），盘皇（在马来半岛），狼牙修（在马来半岛），干陀利（在苏门答腊岛），呵罗单（在爪哇岛），阇婆婆达（在爪哇岛），诃罗陀（待考），婆利（今巴厘岛），掸国（今缅甸）等。

由于外贸的繁盛，使古广府地区的百姓早就对外国的生存空间有所认识，可能此时已有人移居海外，有人出国去做生意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节 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是 世界最长的贸易航线

唐代中国是世界三大强国之一，广州因而亦有引起世界注目的发展。此时内外港口逐步完善，714年（开元二年），朝廷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专管外贸的官员），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兴旺。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最长的贸易航线。对照古书记载看今日地图，可知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经越南，抵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通过马六甲海峡，西航尼科巴群岛，至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再从印度的奎隆出发沿岸西行，经巴基斯坦的第乌尔，进入波斯湾头的阿巴丹和奥布兰等地，如再换乘小舟，可到巴士拉港。记录此航程写下《广州通海夷道》一书的唐德宗时高官贾耽，还记载了从东非的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至奥布兰的航程，说明中国船到波斯湾头后，亦与东非船舶有贸易关系。这航线的“世界之最”保持了八九百年，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欧洲人开辟的东方航道打破。

广州作为唐朝海上交易中心之繁盛，唐代诗人刘宾客在《酬南海马大人诗》中有记载：“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此时应有广州商人到外国并定居，不过古籍并未记载，只记有宗教文化活动中者。如671年（咸亨二年），僧义净（俗名张文明，范阳人）从广州乘波斯船先至室利佛逝（今属印度尼西亚），后赴天竺（印度）取经。689年（永昌元年），他返广州邀孟怀业、贞固等人，到室利佛逝译经。后来孟怀业终老当地。

756~792（天宝十五年至贞元八年），广州外贸一度萧条，此因安史之乱的影响，岭南也曾有动乱。如763年（广德元年

农历十二月，广州发生市舶使吕太一之乱，长达 3 年，影响外贸。至 769 年（大历四年），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采取灵活的措施吸引外商，于是外贸复盛。773 年（大历八年），岭南又爆发哥舒晃之乱，朝廷派路嗣恭率军平乱，不少商人涉及乱事被杀，外贸又走下坡。从 793 ~ 878 年（贞元九年至乾符五年），广州外贸再盛，京城也充斥从广州进口的外国货物。乾符六年正月至闰十月，黄巢农民起义军占据岭南，攻进广州，广州的外商也遭杀戮，使外贸大受影响。动乱时有一批避难的广州商人逃到东南亚，成为广州的第一批出国移民（此前的出国者皆是个别出行的）。

891 年（景福二年），广州外贸复盛，当时广州外商云集。死于 957 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马素地生前曾撰文说：“广州是一个大城市……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祆教人就有 20 万人。”那时广州城西的蕃坊是外商聚居之地，广州人与外国人接触得多，对外国情况也有进一步了解。

唐代广州沿海交通空前活跃，东线出珠江口，至潮州，到闽浙各港，接通新罗国（今属朝鲜半岛）、日本的国际航线。至于西南航线，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与一些西方学者记录的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相同。外国学者苏莱曼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该书还提及航行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唐船体积比其他国家的船要大，这些船相当数量是从广州启航的。

唐代广州对外贸易有三大伙伴。一是东南亚地区的室利佛逝国，二是南亚地区的天竺（印度），三是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包括波斯，708 年波斯被大食所灭）。室利佛逝是唐代时东南亚的强盛国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航道，拥有重要的外贸港末罗瑜。咸亨至开元年间（670 ~ 741 年），室利佛逝多次派遣使者来华。那个时代有广州人到室利佛逝居住是很正常的。

与广州常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林邑、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拂菻（东罗马帝国）、丹丹（今马来半岛吉兰丹）、盘盘、堕和罗（今泰国中部）、陀洹（在今缅甸境）、婆利（今印尼巴厘岛）、罗越（今马来半岛柔佛）、尼婆罗（今尼泊尔）、鬬宾（今克什米尔）等，还有前朝未见记载的哥罗舍分（今泰国境内）、甘毕（在苏门答腊岛）、修罗分（今泰国境内）、弥臣（在缅甸境内）、多摩长（在马来半岛）等。

还应指出，广州附近的佛山，在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已由于经济发展而成为我国四大名镇之一，佛山一带的百姓自然也对外国有较多认识了。

据刘子政《婆罗洲与中国历史上的关系初探》载：“唐宋时代，搜求铜及铁，由福建广东伸张到南洋各地。福建、广东人南下到砂拉越山都望开始冶铁工业。”由此可见，中外交往早已从贸易发展到工业领域了。

总的来说，唐代的广州乃东方名港、中外贸易活跃之地，造就了广府人开放的心态及出国的方便。唐代中国人出国定居是不少的，这当中的广府人有经商的、从事宗教文化交流的、避战乱的，他们艰苦创业，成为广府华侨的先驱。

第三节 宋、元两代广州人与外商 的往来超过前朝

唐代以后是五代十国时期，岭南是刘氏执政的南汉国天下，首府兴王府即广州。古书说南汉国君“笼海商得法”，“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原”，“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这也为以后宋代广州的繁荣打下基础。

南汉首任国君高祖刘岩时，闻得占城（今越南南方）盛产

水兕、山羊、犀角、孔雀，但从未与中国通商，于是命大将梁克贞统领船队航海至占城，以兵力相威胁，载宝而还，令海外各国皆慑服南汉之盛。南汉国君还常在宫中亲自招待海外商人。大宝六年（963年），南汉后主刘铨迎佛教云门宗宗师文偃真身入宫，还请各界人士、海外商人入王宫中观礼。后主还娶波斯女子为妃，此可见当时中外关系的融洽。

与我国接壤的越南，在夏、商、周三代称为交趾，秦代统一岭南后称为象郡。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于公元前111年在岭南置9郡，其中3郡在今越南境内，即交趾、九真、日南。三国时代，这3郡改为交州所属，唐代改称安南。唐宋之交，安南境内大乱，地方的拥兵者割据称雄。后来州刺史丁公著之子扫平群雄，于968年（宋开宝元年）称帝，建立“大瞿越国”，脱离中国。从此以后移居越南的中国人才居华侨之列。

971年（宋开宝四年），宋朝灭南汉后，即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1080年（元丰三年），正式修订了世界上最早的贸易法规《广州市舶条法》，促进了广州的外贸。虽然，宋朝后来又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设市舶司，开辟新的外贸港口，但北宋时广州市舶司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造船工艺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使远洋船能开得更远、走更复杂的航线，抵达更多的国家。当时与广州往来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见诸记载的有50多个，范围包括今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东非等地。其中关系密切的首推大食诸国（今波斯湾），其次是阇婆（今印尼中爪哇地区）、三佛齐（今属印尼，包括原室利佛逝）、占城（今越南南方），还有真腊（今柬埔寨）、罗斛（今泰国中部）、登流眉（今泰国南部）、蒲巴（今缅甸中部）、渤泥（今文莱）、注辇国（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单马锡（今新加坡）、勿期里（今埃及）、狮子国等。随着贸易关系之密切，当有广府人暂住或常住这些国家或地区。

元代，广州所造的远洋商船，比前代有更大的进步。曾随元顺帝游历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依本在《游记》中记述广州的巨型海舶说：有帆 12 张，橹 20 棹，每橹需 30 人摇；船共 4 层，可载 1 000 人。另一位西方中世纪大游历家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写的《东游录》，也说广州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队。元代海外贸易范围比宋代更广，虽然不少人说广州的外贸地位已逊于福建泉州，但元代到广州的外商国别比前代更多。广州海外交通航线有至占城、交趾（今越南北方）、暹罗（今泰国）、三佛齐、阇婆、佛坭（今加里曼丹）、印度半岛、波斯湾，乃至东非、西欧等地的。《元大德南海志》记述与广州有使臣、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共达 140 多个，其中包括今之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索马里、西班牙、摩洛哥等地。

元代的广州，仍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商业城市，依本在《游记》中记：“秦克兰（即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大城市所不及。”

元代的泉州、广州是两大外贸城市，两地百姓对外交往频繁，了解到不少外国的情况，这正是后来两地百姓出国人数最多的潜在因素。也许在元代，两地已有不少人出国常住，只是未见诸详实的史料记载罢了。

第四节 明清时广州“一口通商” 方便了广府人出国

明代，朝廷颁行“海禁”时紧时弛，但广州府基本上仍是外贸不断。海禁时官商被禁止，但私商仍不断出洋。明初的

1370年（洪武三年），朝廷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市舶提举司，有接待外商的驿馆，宁波的名“安远”，泉州的名“来远”，广州的名“怀远”，朝廷规定各地通商地域，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真腊、暹罗、爪哇、三佛齐等12国。可见广州的外贸地位在泉州之上。到1374年，朝廷撤消三地的市舶司，至明成祖时才恢复。1405年（永乐三年），三宝太监郑和奉皇命下西洋，至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共7次远渡重洋，到过东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等36个国家。此举也令广州外贸随之活跃。1522年（嘉靖元年），全国海禁复烈，只留下广州市舶司，广州成了惟一合法的外贸口岸。广州的怀远驿（今十八甫、杨巷路一带）接待外商居住，最盛时有120所房屋，促使附近的西关也成了热闹的市集，中外贸易颇盛。1567年（隆庆元年）起，海禁撤消，广州商人出洋贸易人数更大增。1600年（万历廿八年），朝廷再度开放广州、泉州两地市舶司，直至明亡。

明代常到广州贸易的有12~15个国家，包括日本、朝鲜、暹罗、占城、利加、苏禄国（今属菲律宾）、渤泥、古里（今印度西岸）、古麻喇（今肯尼亚范围）、爪哇、真腊、柯支（今印度西部）、锡兰山（斯里兰卡）、苏门答刺（苏门答腊）、榜格兰（今孟加拉）等。

1553年（嘉靖卅二年），葡萄牙人贿赂官府，借口货物浸湿，需在澳门（时称濠镜）晒货，便住下来。1577年（万历五年）又买通官府代奏朝廷，租借澳门为定居贸易地。次年，皇帝准予他们定居，并每年夏、冬两季到广州海珠岛进行定期集市贸易（相当于交易会）。以后，澳门成了广州外贸航线重要的一站。因澳门隶属香山县，也使香山县的外贸加速发展，方便了广府人特别是香山人出洋。

清初，朝廷也实行海禁，1647年（顺治四年）颁布《大清